

# 傳習錄

〔明〕王陽明 撰  
〔日〕佐藤一齋 注評  
黎業明 整理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 傳習錄

〔明〕王陽明 撰

〔日〕佐藤一齋 注評

黎業明 整理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传习录 / (明)王阳明撰; (日)佐藤一斋注评;  
黎业明整理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8. 8  
(国学典藏)  
ISBN 978-7-5325-8941-8

I. ①传… II. ①王… ②佐… ③黎… III. ①心学—  
中国—明代②《传习录》—注释 IV. ①B248. 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52737 号

## 传习录

【明】王阳明 撰

(日)佐藤一斋 注评

黎业明 整理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
(2) E-mail: [guji1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1@guji.com.cn)

(3) 易文网网址: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125 插页 5 字数 182,000

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100

ISBN 978-7-5325-8941-8

B·1069 定价: 39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## 前言

黎业明

王守仁(1472—1529),字伯安,浙江余姚人,因其曾经筑室并讲学于阳明洞,学者称阳明先生。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,也是著名的政治家、教育家。钱穆先生在《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几部书》的演讲中,列举国人必读的经典,有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六祖坛经》、《近思录》、《传习录》<sup>①</sup>。其中,《传习录》为王阳明的一部语录体著作,是几本书中距今最近的一部中国哲学经典。

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收入《王文成公全书》的《传习录》(此为通行本,简称全书本《传习录》),共有三卷。其中,上卷收录徐爱、陆澄、薛侃记录的阳明先生问答语 130 条;中卷收录阳明书信 8 封、短文 2 篇;下卷收录陈九川、黄直、黄修易、黄省曾等记录阳明先生问答语 143 条。然而,阳明《传习录》的内容,并不是始终如一的,而是在不同时期的编辑、刊刻过程中,经过多次的增订删减之后,最后由钱德洪编定。

阳明《传习录》的第一个刊刻本,是正德十三年(1518)八月薛侃

<sup>①</sup> 钱穆《中国文化丛谈》,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16年,第191—214页。案:此文为1967年12月17日钱穆先生在复兴中国文化会的演讲稿。

在虔州(今江西赣州)刊刻的。钱德洪《阳明先生年谱》云,薛侃“得徐爱所遗《传习录》一卷,序二篇,与陆澄各录一卷,刻于虔”<sup>①</sup>。薛侃初刻本《传习录》可能已经失传。根据后来一些比较接近初刻《传习录》的版本(例如,明嘉靖三十三年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、嘉靖年间间东刊本《阳明先生文集》所附《传习录》等)所收录的相关内容,可知初刻《传习录》共收录徐爱、陆澄、薛侃记录的阳明先生问答语131条,分为三卷。其中徐爱所记阳明先生问答语14条、陆澄所记81条、薛侃所记36条。虽然徐爱所记录的阳明问答语只存留14条,但这14条语录却是十分重要的,其中多涉及阳明的核心思想观念,如“心即理”、“格物致知”、“知行合一”等范畴与命题。钱德洪《阳明先生年谱》记载正德四年(1509)阳明在贵阳与席书等讨论“知行合一”问题时,引证的就是徐爱所记其与阳明先生关于“知行合一”问题的问答语<sup>②</sup>。

初刻《传习录》三卷与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上卷相比较,两者所收录的阳明问答语之数目、内容大体相同。所不同的是,根据后来一些比较接近初刻《传习录》的版本,例如嘉靖三十三年(1554)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、嘉靖年间间东刊本《阳明先生文集》所附《传习录》等,初刻《传习录》将“先生曰:持志如心痛。一心在痛上,岂有工夫说闲话、管闲事”条置于陆澄所记阳明问答语之首,将“孟源有自是、好名之病”条置于薛侃所记之末;而全书本《传习录》则将“先生曰:持志如心痛。一心在痛上,岂有工夫说闲话、管闲事”条,置于陆澄所记“问上达工夫”条之后、“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”条之前,并且

<sup>①</sup> 王守仁《王阳明全集》(吴光、钱明、董平、姚延福编校)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,下册,第1385页。

<sup>②</sup> 王守仁《王阳明全集》,下册,第1355—1356页。又参《王阳明全集》,上册,第4—5页。

删除“先生曰”三字<sup>①</sup>，将“孟源有自是、好名之病”条置于陆澄所记“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”条之后、“问后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乱正学”条之前<sup>②</sup>，并删除陆澄所录“‘千古圣人只有这些子。’又曰：‘人生一世，只有这件事’”一条。

阳明《传习录》的第二个刊刻本，由南大吉、南逢吉兄弟于嘉靖三年（1524）十月在绍兴刊刻。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分为上下两册，上册为语录，下册为书信及短文。由于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原刻本之完整版本可能已经失传，因此人们对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原刻本的内容、尤其是下册的内容议论纷纷。一般认为，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原刻本上册所收录的内容，就是薛侃在赣州初刻《传习录》三卷徐爱、陆澄、薛侃所记阳明先生语 131 条，这可以从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的一些重刻本（例如，明嘉靖二十九年王畿刊刻《阳明先生文集》所附重刻本《传习录》等）得到证实。但是，对于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原刻本下册所收录的内容，学术界则议论纷纷，而且多根据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的重刻本来推断。

其实，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下册似尚残存世间，这就是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明刊本《传习录》。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明刊本《传习录》，现存下册四卷（分别题为“传习录下卷一”、“传习录下卷二”、“传习录下卷三”、“传习录下卷四”），其卷一为《答徐成之书》（二首，附南逢吉跋语）、《答罗整庵少宰书》；卷二为《答人论学书》（即《答顾东桥书》）；卷三为《答周道通书》、《答陆原静书》（二首）；卷四为《示弟立志说》、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》、《教约》。隆庆五年（1571），冯柯撰作《求是编》一书，批评阳明《传习录》。其《求是编》卷四之末云：“或曰：‘《传习录》近有增定者，视旧加详而辩不及，何

① 王守仁《王阳明全集》，上册，第 15 页。

② 王守仁《王阳明全集》，上册，第 13 页。

也?’曰:‘余所辩《传习录》,盖上册是阳明在赣时其徒徐曰仁、陆原静、薛尚谦之所录,而下册则阳明归越而郡守南元善益以问答诸书者也。观其序云“师之在日,精神足以自致,尚不能无赖于是录之助”,则是录实阳明亲所裁定,而犹有遗论若此,况今所增定乃出于其没后钱德洪、王汝中之手,其又何足以为据而与之辩哉?’”<sup>①</sup>然则,冯柯批评《传习录》,其所依据的,应为南大吉嘉靖三年续刻《传习录》之原刻本。而从《求是编》所选录或摘录之阳明言论观之,其涉及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下册内容者,有《答徐成之》(二)、《答罗整庵少宰书》、《答顾东桥书》、《答周道通书》、《答陆原静书》(一、二),无《答欧阳崇一》以及《答聂文蔚》(一、二)<sup>②</sup>;而且,其引述的书信排列顺序,都与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明刊本《传习录》相同。两相比照,可知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明刊本《传习录》,疑即南大吉嘉靖三年续刻《传习录》之原刻本。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明刊本《传习录》,亦无《答欧阳崇一》以及《答聂文蔚》(一、二)。

后来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曾有过多重刊,如嘉靖二十三年(1544)德安府重刊《传习录》<sup>③</sup>、嘉靖二十九年(1550)王畿重刊本《传

① 冯柯《求是编》,冈田武彦、荒木见悟主编:《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·思想三编》第15册,日本京都:中文出版社,1977年影印本,第337—338页。冯柯《贞白五书·求是编》,张寿镛辑《四明丛书》第22册,扬州:广陵书社,2006年影印本,第13354页。案:冯柯《求是编》引述的所谓序云“师之在日,精神足以自致,尚不能无赖于是录之助”数言,出自王畿《重刻传习录序》。可见,冯柯读过王畿重刻本《传习录》。然而,冯柯并没有使用王畿重刻本《传习录》,而是使用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之原刻本。

② 冯柯《求是编》,冈田武彦、荒木见悟主编:《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·思想三编》第15册,第240—334页。冯柯《贞白五书·求是编》,张寿镛辑《四明丛书》第22册,第13331—13353页。案:冯柯《求是编》中,最后一条,即“良知者,孟子所谓‘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’者也。是非之心,不待虑而知,不待学而能,是故谓之良知”条,《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·思想三编》第15册,第334—338页;《四明丛书》第22册,第13353—13354页)并不是出自阳明《传习录》,而是出自《大学问》。《大学问》乃阳明于嘉靖六年(1527)起复征思、田,即将离浙江赴广西时所作。(参王守仁撰:《王阳明全集》中册,第1066页)

③ 限于条件,此版本未能得见。兹据佐藤一斋的叙述。(佐藤坦《传习录栏外书》,日本东京:启新书院印刷、松山堂书店发行,1919年第十八版,卷首;佐藤坦《传习录栏外书》[山崎道夫校注],《佐藤一斋全集》第五卷,日本东京:明德出版社,1998年,第346页)

习录》(中国国家图书馆藏)、嘉靖三十三年钱锺重刊《传习录》(温州图书馆藏)等,其中对于阳明先生书信与短文的收录颇有出入。为免繁琐,兹将从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下册到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中卷内容的变迁,择要表列如下:

附:从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下册到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中卷内容变迁表

篇 名	南大吉 续刻本	德安府 重刊本	王畿 重刊本	钱锺 重刻本	王文成 公全书
《答徐成之书》(二首)	√	√	√	√	
《答罗整庵少宰书》	√	√	√	√	√
《答人论学书》(即《答顾东桥书》)	√	√	√	√	√
《答周道通书》(或《启问道通书》)	√	√	√	√	√
《答陆原静书》(二首)	√	√	√	√	√
《答欧阳崇一》		√	√	√	√
《答聂文蔚》(一)		√	√	√	√
《答聂文蔚》(二)		√			√
《答储柴墟书》(二首)		√			
《答何子元书》		√			
《示弟立志说》	√	√	√	√	
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》	√	√	√	√	√
《教约》	√	√	√	√	√
《修道说》				√	
《亲民说》				√	

由上可见,从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下册到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中卷,其收录的阳明书信及短文数目,前后经历过多次的增订或删除。对于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的每一次重刻,都有所增订。长期以来,人们多将经过增订的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之重刻本,视为南大吉续

刻《传习录》之原刻本，忽略古籍之重刻本多有增删之例，作出了许多不符合事实的论述。阳明的最重要弟子之一钱德洪，在《阳明先生年谱》、在胡宗宪刊本《传习录》与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中卷小序中，将王畿二十九年重刻本《传习录》视为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之原刻本，提出了一些错误或不准确的说法（如所谓“复增五卷”、“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”等<sup>①</sup>），使后人深感困惑。如果能利用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明刊本《传习录》下册（疑即南大吉嘉靖三年续刻《传习录》原刻本之残存本），这些长期令人困惑的问题，基本上都可以得到解决。

阳明《传习录》的第三个重要刊刻本，是嘉靖三十三年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。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分为“传习录”、“传习续录”两部分，两部分均为阳明先生问答语，没有收录阳明先生的书信及短文。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之“传习录”部分三卷，其卷一收录徐爱所记阳明先生问答语 14 条，卷二收录陆澄所记 81 条，卷三收录薛侃所记 36 条。其“传习录”部分的内容，与薛侃初刻本《传习录》内容相同。

比较复杂的是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之“传习续录”部分。“传习续录”部分两卷（题为“传习续录卷上”、“传习续录卷下”），卷首有钱德洪《续刻传习录序》。“传习续录卷上”，署名为“门人陈九川录”，共收入阳明先生问答语 60 条（其第一条为“正德乙亥，九川初见先生于龙江”条，其最后一条为“问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”条），其中陈九川所录 21 条，王以方所录 13 条（案：“王以方”，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原文如此，应作“黄以方”。黄直，字以方，号卓峰，江

<sup>①</sup> 王守仁《王阳明全集》，下册，第 1427 页；王守仁《传习录》，嘉靖三十七年胡宗宪刊本，“传习录中卷一”，卷首；王守仁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6 年“四部丛刊”缩印本，第一册，第 88 页。

西金溪人),黄勉叔所录 13 条,黄勉之所录 13 条<sup>①</sup>。“传习续录卷下”,署名为“门人钱德洪、王畿录”,共收入阳明先生问答语 58 条(其第一条为“何廷仁、黄正之、李侯璧、汝中、德洪侍坐”条;最后一条为“南逢吉曰:吉尝以《答徐成之书》请问”条,且标明“此本在《答徐成之书》下,今录于此”),当中没有“传习续录卷上”所出现的“已下×××录”字样,则这 58 条阳明先生答问语,均为钱德洪、王畿所录。而且,在这 58 条阳明先生答问语中,出现钱德洪、王畿名字时,钱德洪多称其名“德洪”而不是其字“洪甫”,王畿则多称其字“汝中”,可见这部分阳明先生问答语,多为钱德洪所录<sup>②</sup>。既然这 58 条为钱德洪、王畿所记录,那么黄宗羲根据“先生曰:苏秦、张仪之智,也是圣人之资”等语录,说“《传习后录》有先生(指黄省曾)所记数十条,当是采之《问道录》中,往往失阳明之意”<sup>③</sup>,可谓为对黄省曾的一大冤枉。

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之“传习续录”部分,与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下卷的相关部分比照,彼此差异颇多。一是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之“传习续录”部分所收录阳明先生问答语,与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下卷的相关部分所收录阳明先生问答语有出入。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“传习续录卷上”中的“先生曰:良知犹主人翁,私欲犹豪奴悍婢。主人翁沉疴在床,奴婢便敢擅作威福,家不可以言齐矣。若主人翁服药治病,渐渐痊可,略知捡束,奴婢亦自渐听指挥。及沉疴脱

<sup>①</sup> 永富青地先生说,“陈九川录三十四条,黄勉叔录十三条,黄勉之录十三条”。(永富青地《王守仁著作的文献学方面研究》,东京:汲古书院,2007年,第32页)其中没有提及“王以方录十三条”。所谓“陈九川录三十四条”,恐系将“王以方录十三条”误入“陈九川录”。

<sup>②</sup> 其实,陈龙正在没有见到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之情况下,就已经将“何廷仁、黄正之、李侯璧、汝中、德洪侍坐”以下五十余条,考定为钱德洪所记录。他说:“此下五十一条,据原集,皆黄省曾录。然他友皆字,德洪独名,其为绪山手录无疑。集讹刻耳,今正之。”(陈龙正辑《阳明先生要书》,济南:齐鲁书社,1997年,集部第四九册,第89页)

<sup>③</sup> 参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(沈芝盈点校),北京:中华书局,2008年,上册,第581—582页。

体,起来摆布,谁敢有不受约束者哉?良知昏迷,众欲乱行;良知精明,众欲消化,亦犹是也”、“先生曰:合着本体的,是功夫;做得功夫的,方识本体”两条,“传习续录卷下”末尾的“南逢吉曰:吉尝以《答徐成之书》请问”一条<sup>①</sup>,是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下卷的相关部分所没有的。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下卷的相关部分的“先生曰:圣贤非无功业节气,但其循着这天理,则便是道,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”、“‘发愤忘食’,是圣人之志,如此真无有已时;‘乐以忘忧’,是圣人之道,如此真无有戚时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”、“先生曰:孔子无不知而作,颜子有不善,未尝不知,此是圣学真血脉路”三条<sup>②</sup>,是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之“传习续录”部分所没有的。二是除“又曰:此道至简至易的,亦至精至微的”、“问:孔子曰‘回也非助我者也’”两条外<sup>③</sup>,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下卷“此后黄以方录”27条中的25条<sup>④</sup>,均为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之“传习续录”部分所无。三是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之“传习续录”,将“何廷仁、黄正之、李侯璧、汝中、德洪侍坐”至“先生初归越时,朋友踪迹尚寥落”,共58条,乃署名为“门人钱德洪、王畿录”;而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下卷则将其归入“门人黄省曾录”<sup>⑤</sup>。从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之“传习续录”部分与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下卷相关部分的差异看,钱德洪在编定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下卷时,对于阳明先生问答语颇有增订、删减、移易,这些对于阳明先生问答语的

① 王守仁《传习录》,《孔子文化大全:中说、传习录、四存编》,济南:山东友谊书社,1994年影印本,第322、323、377—379页。

② 王守仁《王文成公全书》,“四部丛刊”缩印本,第一册,第134、140页;王守仁《王阳明全集》,上册,第109、118页。

③ 此两条见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“传习续录卷上”之末。(王守仁《传习录》,《孔子文化大全:中说、传习录、四存编》,第333—334页)

④ 王守仁《王文成公全书》,“四部丛刊”缩印本,第一册,第152—158页;王守仁《王阳明全集》,上册,第134—142页。

⑤ 陈来先生对于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及其与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下卷的差异,有颇为详细的论述。(参陈来《〈遗言录〉与〈传习录〉》,《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3年,第597—601页)

增订、删减、移易，所体现的是钱德洪对于阳明思想的理解，是钱德洪对于编辑刊刻阳明文献的观点与态度。

在水西精舍刊本《传习录》之后，还有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崇正书院刊本《传习录》，这是阳明《传习录》的第四个重要刊刻本。崇正书院刊本《传习录》是否存留世间，有待考证。目前，在我们有幸见到的各种版本《传习录》中，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胡宗宪刊本《传习录》，可能是既比较接近崇正书院刊本《传习录》<sup>①</sup>，又是最接近全书本《传习录》的版本。其实，全书本《传习录》主要根据胡宗宪刊本《传习录》加以删减、增订而成。目前存留世间的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有两种不同的版本，一是隆庆二年（1568）郭朝宾等杭州刊本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一是隆庆六年（1572）谢廷杰等刊本《王文成公全书》<sup>②</sup>。随着谢廷杰刊本《王文成公全书》的梓行，其中所收录的《传习录》，这部王阳明著作中最重要、最有影响的著作，其内容就确定下来了。

王阳明《传习录》刊行之后，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长期以来，有人对其加以批评，有人对其加以诠释。在中国，对阳明《传习录》加以批评或诠释的著作之中，冯柯的《求是编》、施邦曜辑评的《阳明

① 由于崇正书院刊本《传习录》是否存世尚待考证，因此，我们无从比较胡宗宪刊本《传习录》与崇正书院刊本《传习录》的异同。我们之所以说胡宗宪刊本《传习录》有可能是比较接近崇正书院刊本《传习录》的版本，是从其刊刻时间十分接近、相距不到两年而作出的推测。

② 此处，将郭朝宾本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之刊刻时间系于隆庆二年、将谢廷杰本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之刊刻时间系于隆庆六年，系采用传统说法。据朱鸿林先生考证，郭朝宾本并非刊刻于隆庆二年，而是刊刻于隆庆六年；谢廷杰本亦非刊刻于隆庆六年，而是刊刻于万历元年（1573）。（参朱鸿林《〈王文成公全书〉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》，《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317—322页）朱先生关于郭朝宾本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不是刊刻于隆庆二年、而是刊刻于隆庆六年的说法，是正确的。因为郭朝宾本《王文成公全书》所收录的《朱子晚年定论》，有钱德洪撰小序。小序中有“隆庆壬申，虬峰谢君廷杰刻师《全书》，命刻《定论》附《语录》后，见师之学与朱子无相缪戾，则千古正学同一源矣”之说。（王守仁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明隆庆年间郭朝宾刊本，第三卷，第63页）隆庆壬申，即隆庆六年。

先生集要》(与《传习录》相关部分)、刘宗周的《阳明传信录》、陈龙正辑评的《阳明先生要书》(与《传习录》相关部分)、王应昌的《王阳明先生传习录论》、孙锵的《传习录集评》、许舜屏的《评注王阳明先生全集》(与《传习录》相关部分)、但衡今的《传习录札记》等都是十分重要的;在日本,对阳明《传习录》加以批评或诠释的著作之中,三轮执斋的《标注传习录》、佐藤一斋的《传习录栏外书》、东正纯的《传习录参考》等都是比较著名的。在日本学者对阳明《传习录》的批评或诠释著作中,以佐藤一斋的《传习录栏外书》最为著名。

## 二

佐藤一斋(1772—1859),名坦,字大道,号惟一斋,又号爱日楼、老吾轩。初名信行,称几久藏,年二十一,始改名为坦,称舍藏。日本江户人。著名学者、教育家。

日本安永元年壬辰(1772)十月廿日,佐藤一斋出生于江户浜街邸舍。其家系出大职冠镰足。其曾祖广义,号周轩,始以儒仕岩村侯,升家老。祖信全,袭父职。父信由,称勘平,号文永,袭职,执国政凡三十余年;母蒔田氏<sup>①</sup>。

佐藤家深得藩主信任,佐藤一斋自年少时起,即与林述斋关系密切。(林衡,字叔统,一字公鉴,号述斋,为岩村藩主松平乘蒞之第三子,原名松平乘衡。宽政五年,其二十六岁时,幕府祭酒林简顺卒,无嗣,特命松平乘衡继其后,因改其姓名。卒后,谥快烈府君<sup>②</sup>。)宽政四年(1792)二月,一斋得林述斋资助,游浪华(大阪),从学于中井竹山。对于从学中井竹山之事,佐藤一斋自述云:“居半年,日夜

<sup>①</sup> 本文叙述佐藤一斋生平学行,除注明者外,主要参照松村操编《近世先哲丛谈续编》,日本东京:岩岩堂,1882年,卷下,第1—20页,“佐藤坦”(目录作“佐藤一斋”)条。

<sup>②</sup> 参松村操编《近世先哲丛谈续编》,卷上,第43—50页,“林衡”(目录作“林述斋”)条。

在侧，讨论经义，辄至夜半。先生乃喜其切问，不以为可厌。然数有乡信，两慈手书沓至，不得已而决归。先生有诗见贶，曰：‘闻君客迹自浓藩，目击俱欣吾道存。累旬未极新知乐，归路俄惊远别魂。世故易抬双白眼，词场且对一青樽。妙年将任斯文责，何日游踪再及门。’又书一行大字见贶，其语为‘困而后寤，仆而复兴’八字。余问出处，先生曰：“‘仆而复兴’为王文成语，首句则今临笔加之耳。”<sup>①</sup>从此，佐藤一斋开始注意阳明之学。随后，又得林述斋（当时尚为岩村藩公子）购赠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当时佐藤一斋二十二岁<sup>②</sup>。此为佐藤一斋信奉阳明学之机缘。

佐藤一斋著作宏富，主要有：《周易栏外书》（10卷）、《易学启蒙栏外书》（1卷）、《尚书栏外书》、《大学栏外书》（1卷）、《中庸栏外书》（1卷）、《论语栏外书》（2卷）、《孟子栏外书》（2卷）、《孝经解意补义》（1卷）、《小学栏外书》（1卷）、《近思录栏外书》（3卷）、《传习录栏外书》（3卷）、《言志四录》（4卷）等；诗文则辑为《爱日楼全集》（56卷）。1990年代，为纪念佐藤一斋诞辰220周年，日本明德出版社梓行《佐藤一斋全集》（冈田武彦监修，全十四卷）。据说，五经之中，佐藤一斋“最精《周易》”<sup>③</sup>；其最重要著作为《言志四录》，“其学之造诣，就此四卷可见其全体”<sup>④</sup>。

对于其学术倾向，佐藤一斋自称不立名目、强调自得，曰：“古人各有得力处，举以指示可也，但其入路各异，后人不能透会得之，乃偏于所受，执一以为宗旨，终至于生流弊。余则欲透会为一，不立名

① 简野道明阅、国语汉文研究会编《新注言志四录》，日本东京：明治书院，1936年，第210页。案：《近世先哲丛谈续编》将中井竹山赠诗误作林述斋赠诗。（松村操编《近世先哲丛谈续编》，卷上，第49页）

② 山崎道夫《佐藤一斋》，日本东京：明德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21—22页。

③ 松村操编《近世先哲丛谈续编》，卷下，第11页。

④ 松村操编《近世先哲丛谈续编》，卷下，第13页。

目。其不立名目，即便我宗旨也。”<sup>①</sup>又说：“勿装门面，勿陈家当，勿揭招牌，勿假他物以夸衒。书以自警。”<sup>②</sup>对于程朱陆王，佐藤一斋乃师法藤原惺窝<sup>③</sup>，主张兼取并容，他说：“濂洛复古之学，实为孔孟之宗，承之者紫阳、金溪及张、吕，虽有异同，而其实皆纯全道学，决非俗儒之流。于元则静修、鲁斋，明则崇仁、河东、余姚、增城，是其选也，亦虽各有异，皆一代之贤儒，其遡洄濂洛则一也。上下千载，落落唯有此数君子而已。吾取而尚友之，于心乐焉。”<sup>④</sup>又曰：“朱陆同宗伊洛而见解稍异，二子并称贤儒，非如蜀朔之与洛为各党。朱子尝曰‘南渡以来，理会着实工夫者惟某与子静二人’，陆子亦谓‘建安无朱元晦，青田无陆子静’，盖其互相许如此。当时门人亦有两家相通者，不为各持师说相争。至明儒如白沙、篁墩、余姚、增城，并兼取两家。我邦惺窝藤公盖亦如此。”<sup>⑤</sup>

然而，对于佐藤一斋之学术主张、学术倾向，后人之见解与佐藤一斋之自述并不一致。其门人若山拯曰：“其学虽宗宋儒，不喜分析而主一本，不贵该博而要深造，以达心之灵光为宗旨焉。”<sup>⑥</sup>《近世先哲丛谈续编》云：“一斋虽奉宋儒之学，实钦慕王文成。”<sup>⑦</sup>朱谦之先生曰：“一斋一生的贡献，在朱子学派的林氏教团的包围之下发展了阳明学，其学术表面上是调和朱王，实际上则阳朱阴王”；“一斋所著如

① 简野道明阅、国语汉文研究会编《新注言志四录》，第146—147页。

② 简野道明阅、国语汉文研究会编《新注言志四录》，第94页。

③ 佐藤一斋曾说：“惺窝藤公《答林罗山书》曰‘陆文安天资高明，措辞混括，自然之妙亦不可掩焉’，又曰‘紫阳笃实而邃密，金溪高明而简易，人见其异不见其同，一旦贯通，同轨异坎，必自知而后已’。余谓我邦首唱濂洛之学者为藤公，而早已并取朱陆如此。罗山亦出其门，余曾祖周轩受学于后藤松轩，而松轩之学亦出自藤公。余钦慕藤公，渊源所自，则有乎尔。”（简野道明阅、国语汉文研究会编《新注言志四录》，第140页）

④ 简野道明阅、国语汉文研究会编《新注言志四录》，第129页。

⑤ 简野道明阅、国语汉文研究会编《新注言志四录》，第139页。

⑥ 若山拯《惟一佐藤先生墓碣铭》，佐藤坦《论语栏外书》，台北：艺文印书馆，1966年《论语集成》影印本，卷首。

⑦ 松村操编《近世先哲丛谈续编》，卷下，第19页。

《言志录》之类，虽王学的旨意往往散见，而旗帜尚未明显，若‘栏外书’一类书，则分明是王学本色”<sup>①</sup>。可见，在后人眼中，佐藤一斋之学术主张、学术倾向，乃表面似兼取程朱陆王，实质则独弘阳明之学<sup>②</sup>。

### 三

佐藤一斋《传习录栏外书》成书于天保元年(1830)腊月，所据底本乃三轮执斋之《标注传习录》。佐藤一斋《传习录栏外书》卷首自述云：“余于此录，就三轮执斋刻本读之。岁月已久，朱绿漫然，今改钞之。时天保纪元腊月也。”<sup>③</sup>《传习录栏外书》之栏外文字，大体可分为版本异同之校勘、人名地名之解释、前贤评论之征引、阳明思想之诠释以及《传习录》所不载之阳明语录之辑录。显然，佐藤一斋之《传习录栏外书》，既与其前之三轮执斋《标注传习录》之偏重引文、典故出处之考证不同<sup>④</sup>，又与其后之东正纯《传习录参考》之侧重思想义理之疏解有异<sup>⑤</sup>，内容更为全面，地位亦更为重要。

佐藤一斋《传习录栏外书》在《传习录》版本校勘方面，花费精力之多，颇出人意外。粗略统计，佐藤一斋《传习录栏外书》涉及校勘版本之数目，数以十计，如德安府重刊南大吉本、闻东本、王文成公全书本、宋仪望本、白鹿洞本、施邦曜本、俞鳞本、陈龙正本、杨嘉猷本、朱文启本、张问达本、王贻乐本等。涉及版本异同之条目，数以

① 朱谦之《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291、293页。

② 关于佐藤一斋学术主张更详细的讨论，可以参考佐藤一斋《传习录栏外书》（黎业明点校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，前言，第9—17页。

③ 佐藤坦《传习录栏外书》卷首；佐藤坦《传习录栏外书》（山崎道夫校注），《佐藤一斋全集》第五卷，第346页。

④ 三轮希贤《标注传习录》，日本东京：青木嵩山堂，线装刻本，刊刻时间不详。案：三轮希贤(1669—1744)，字善藏，号执斋，平安人。

⑤ 东正纯《传习录参考》，《泽泻先生全集》，日本：川冈事务所，1919年，上册，第623—686页。案：东正纯(1832—1891)，字崇一，号泽泻，周防国岩国人。佐藤一斋门人。安政间，从学于佐藤一斋。

百计,其中,多属于文字之不同者,如《传习录》上卷徐爱所录第一条(即“爱问在亲民”条)“然非‘新’字义”句,佐藤一斋栏外注云:“《全书》‘新’讹作‘亲’。诸本亦多讹。南本、闰本、杨嘉猷本作‘新’。”<sup>①</sup>《传习录》中卷“答人论学书”第三节“又云‘工夫次第不能不无先后之差’,无乃自相矛盾已乎”句,佐藤一斋栏外注云:“‘不无’之‘不’字,施、张、鹿洞并无。”<sup>②</sup>当然,亦有属于《传习录》整个条目差异者,如《传习录》上卷陆澄所录第一条(即“陆澄问主一之功”条),佐藤一斋栏外注云:“南本、施本、宋本,此前尚有一条,如左:先生曰:‘持志如心痛,一心在痛上,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。’……此条,《全书》、陈龙正纂本、朱本、鹿洞本载在‘问上达’条之后,独鹿洞本此处有‘千古圣人’一条以为首,此为异耳。‘千古’全条,今姑从南本录在‘上达’条后,可就考。执斋本皆脱。”<sup>③</sup>

佐藤一斋《传习录栏外书》在前贤评论之征引方面,涉及人物颇为不少,有王畿(龙溪)、季本(彭山)、查铎(毅斋)、王时槐(塘南)、施邦曜、陈龙正、顾宪成、高攀龙、黄尊素、徐象梅、刘宗周、黄宗羲、毛奇龄、朱彝尊、王懋竑、彭定求等<sup>④</sup>。其中较为频繁征引者,乃施邦曜、陈龙正、刘宗周、黄宗羲、彭定求。在佐藤一斋所征引之评论中,多为赞同或诠释阳明之思想观念者<sup>⑤</sup>,如《传习录》上卷徐爱所录第五条“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”句,佐藤一斋引述季本《说理会编》

① 佐藤坦《传习录栏外书》,上卷,第3页;佐藤坦《传习录栏外书》(山崎道夫校注),《佐藤一斋全集》第五卷,第348页。

② 佐藤坦《传习录栏外书》,中卷,第3页;佐藤坦《传习录栏外书》(山崎道夫校注),《佐藤一斋全集》第五卷,第362页。案:两版本文字略有差异,此据《佐藤一斋全集》。

③ 佐藤坦《传习录栏外书》,上卷,第11页;佐藤坦《传习录栏外书》(山崎道夫校注),《佐藤一斋全集》第五卷,第351页。案:两版本文字有异,此据《佐藤一斋全集》。

④ 此外,《传习录栏外书》注释中涉及阳明以前之物则有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司马迁、李翱、邵雍、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苏辙、朱熹、陆九渊、胡三省等。

⑤ 在佐藤一斋所征引之评论中,若非属于赞同或诠释阳明之思想观念者,则其征引多作批评之用,如其征引罗钦顺、冯柯等即属此类。